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

■马戎

【提要】从社会学学科的视角来思考和分析中国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必须从实际社会调查所获得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

【关键词】中国 民族关系 实事求是 代际更替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1)03-0044-02

中国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从社会学学科的视角来思考和分析，我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在认识和分析中国今天的民族关系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从实际社会调查所获得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来讨论问题。凡是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或者在民族地区做深入调查的，我想都会发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现在的民族关系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此我有很深的感触。

1968年到1973年这5年里，我曾到中蒙边界的蒙古族牧区插队当牧民。那时北京知青和蒙族牧民之间，虽然语言不通，习俗不同，但是关系非常好。当时还出现了挖“内人党”的政治运动，我们刚刚从北京来不久，也不懂“内人党”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件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在1968年冬天，我们公社的民兵副连长是蒙古族，他被造反派抓住，关在公社“牛棚”里，晚上他趁看守不注意跑了出来，在附近找了一匹马骑马往北跑，我们公社位于中蒙边界，往北20里就是外蒙古了，他走到中蒙边界，在那儿停了一会，冬天雪地上的马蹄印看得很清楚，之后他又掉头往回跑，过了公社再往南走了20里，最后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他忍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和折磨，就是不愿意离开祖国。而国境外是和他同属一个“民族”，有同样语言习俗的蒙古国。在那样一种政治斗争的条件下，这个蒙族青年干部对我们党和国家仍然是那样的信任和依恋。我听到这件事后受到很大震撼。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这些年来我们到新疆和西藏去做社会调查，有许

多机会和当地的干部、大学生进行交谈，我们感觉从民族关系的气氛上、相互感情上和当年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如果不是当地的民族关系的整体气氛出了大问题，也绝不会发生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有些人总是讲“中国的民族关系是世界上最好的”，“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我觉得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必须从我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社会事实出发，必须看到中国的民族关系确实存在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不能继续脱离社会现实情况来谈中国的民族问题。

在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这就是“代际更替”。各国国家的社会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每一代人都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氛围和社会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剧烈的社会变迁的年代（如战争或革命），儿女一代人的成长环境、世界观形成期间的社会政治环境，很可能与自己的父辈很不一样。当年轻一代到了20岁、30岁并进入各种社会岗位后，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可能和父辈很不一样。所以在社会学研究中，需要实事求是地对每一代的成长环境和行为方式开展社会调查，认识“代际差异”，从而理解在一个国家里大规模的“代际更替”会对社会的运转、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动带来什么影响。

从“代际更替”的视角来分析比较50—60年代和近20年的中国民族关系，代际之间的巨大差异和这些差异给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少数民族青年干部、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和青年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70后”和“80后”甚至“90后”，已经不是他们父辈那一代人了。他们的父辈是40



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他们成长和懂事的年代正是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废除农奴制、新疆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土地无偿分给贫苦农民的年代，当时被剥夺的地主、农奴主是少数，得到解放并分得土地的普通农民是大多数，他们当然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我们党的威信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空前的，即使遇到1959年那样的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各族干部和民众都是从心里拥护党和热爱祖国的。1959年和1960年困难时期的生活条件要比今天苦得多，但是各族民众没有什么怨言。这是老一辈经历了翻身解放和土改分田地所建立的社会价值观，他们现在已经60岁、70岁了，基本上都已退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已减弱。现在他们的子女一代在70年代以后出生，在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年代，听到的大多是“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阅读的是“伤痕文学”，共产党和党的领袖的威望在批判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时受到严重损害。而在改革开放中，他们必然面临升学、就业的激烈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对外开放又使境外各种宗教势力、政治势力渗透到国内，并通过现代通讯工具广泛传播。所以中国少数民族群体（包括干部、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是我们目前面对的非常关键的社会结构变迁，不理解这一点，仍然以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景来想象今天少数民族青年的思想和行为，是一定要做出错误判断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开展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者，我们需要去和普通老百姓、普通大学生、农民工交朋友，听他们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听他们讲对政府的看法、对共产党的看法，他们对政府很多具体政策的看法，他们对生活问题、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实实在在的看法。而且只有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才会告诉你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些真实的观点和情绪，不是通过政府组织的研讨会、座谈会所能够听到的。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嘴里有两套话语，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所以现在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首先要通过交朋友来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情况和真实想法。把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年龄组的少数民族民众的基本情况调查清楚，只有这样，我们的政府对民族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才不会误判。

对现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民生问题，汉族地区也有民生问

题，也有腐败和干群关系问题，也发生过恶性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如瓮安事件。但是同样的民生问题，如果发生在新疆或在西藏，它表现出来形式和社会后果可能很不一样。当地民众会把这些社会矛盾与民族利益联系起来。除了民生问题之外，在少数民族凝聚区还存在一个认同意识或者“民族意识”问题，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是否以“民族身分”区隔为两个不同的群体，我们的少数民族民众在心里是否认同中国和中华民族，还是把自己“民族”的利益放在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认同问题，是我们关注的第二类问题。我们过去的民族理论宣传，过于强调56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和特点，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共性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在这一方面，需要进行讨论和反思。

另外一个需要特殊关注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代际更替”问题。比如法国2005年的街头骚乱，烧了几万辆汽车，问题的核心就是“代际更替”。在法国出生的这些阿尔及利亚青少年的追求和比较的参照系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而法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对此毫无察觉，这个教训我们要吸收。中国的代际问题正好反映了我们这些年来在经济、政治体制包括社会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在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色彩在客观上被突出和强化了，一方面政策给予少数民族的特殊权利和各种优惠比原来加强了，但另一方面社会管理的力度和利益协调补偿机制在减弱，许多政策落不到实处，激烈竞争的市场机制使许多少数民族青年处在不利和被歧视的状况。所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机制弱化了政策调节能力。因此，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强社会调查，同时要开拓视野，积极吸收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印度，这些国家都有相当丰富的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总之，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调查，广泛吸收和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应当有信心把中国的民族关系逐步引导到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才是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的真正的软实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魏静茹